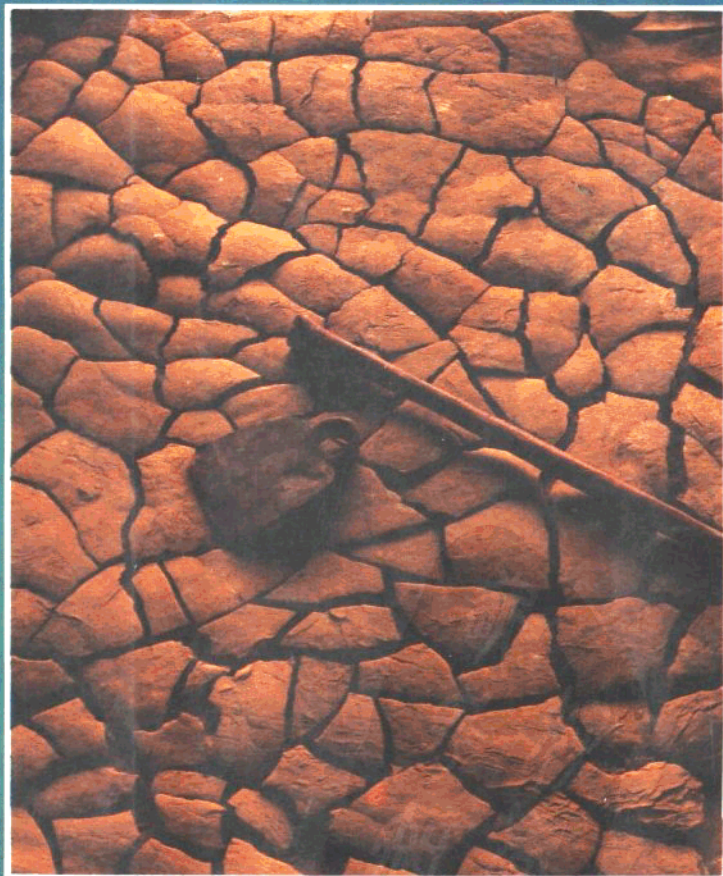


台灣文藝叢書 8

台灣文學的 過去與未來

葉石濤 · 彭瑞金 · 宋冬陽 等著
陳永興 編



台灣文藝叢書 8

台灣文學的過去與未來

陳永興編

1985年9月12日

HS

1112
L07
489

台灣文藝叢書⑧

台灣文學的過去與未來

Past and Future of Taiwan Literature

著者：葉石濤・彭瑞金・宋冬陽等

發行人兼編著者：陳永興

台北市安和路 11 號 2 樓

郵政劃撥：0557389-4 台灣文藝雜誌社

印刷所：海王印刷廠

初版：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三月

定價：新台幣一〇〇元

海外美金六元

總經銷：第一出版社

高雄市八德二路卅七號

電話：(07)2217198

郵政劃撥：0406981-5 柯旗化

目錄

沒有土地，那有文學？

台灣文學應以本土化為首要課題

現階段台灣文學本土化的問題

先人之血，土地之花

日據時代台灣左翼文學運動的發展背景

壓不扁的文學魂

日據下台灣新文學運動的開展

追尋、迷惘與再生

戰後的吳濁流到鍾肇政

從迷惘到自主

第一代到第四代的文學旅程

朝向許願中的黎明

試論吳濁流作品中的「中國經驗」

葉石濤	1
彭瑞金	4
宋冬陽	8
宋冬陽	41
高天生	58
彭瑞金	64
林 梵	72
宋冬陽	79

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

——光復初期的台灣日本文學

日據時期台灣新詩遺產的重估

血淚詩篇盡堪傳

——光復前台灣新詩的特性

光復以後二十年新詩的發展

——光復後二十年到「台灣文藝」創刊為止

承接和創新

——八十年代現代詩之形成和展望

我從事文學的經驗

我的台灣文學經驗

從文學作品看台灣人的形象

給文學界的七封信

新危機與新展望

——鄉土文學論戰後台灣文壇發展的考察

台灣文藝的根

葉石濤 101

宋冬陽 110

羊子喬 134

趙天儀 139

陳明台 150

鍾肇政 156

張良澤 165

李喬 173

宋澤萊 183

高天生 201

陳永興 212

沒有土地，那有文學？

葉石濤

台灣這一塊既美麗又豐饒的大地——乳與蜜流瀉的鄉土，從遙遠的左鎮人、長濱人生存的舊石器時代開始一直是我們漢民族後輩路藍縷以啓山林，銳意經營的大地。這塊豐沃的土地養育了我們一千八百萬自由之民，同時將永遠地提供我們子孫以生活之糧及青翠欲滴的生存空間。

然而，從四百年前開始，這塊土地，被先後入侵的異民族西班牙人、荷蘭人、滿族及日本人所侵佔，因此台灣的主權被迫經過多次的轉移。入侵的異民族不但奴役了我們並且搶奪了我們流血流汗所得的收成，況且污染了我們的雄麗河山。

台灣的歷代漢民族居民常和原住種族並肩作戰，抵抗外來異族的暴政，充分表示了「輕生好勇，慷慨悲歌」的優秀民族精神。一部台灣歷史等於是台灣居民追求自由、幸福的保鄉衛土的抵抗史。

在這樣血跡斑斑的土地上，台灣的知識份子一向代表了台灣居民的良知，同時扮演了指導者的角色

。縱令他們的抗議和控訴在殖民者的摧殘下崩潰而失敗，但他們的抵抗精神却代代相傳，永無消失的一天。這構成了台灣知識份子的傳統精神，這種抵抗精神往往是情緒性的抗拒異民族侵略的民族主義，但是在近代却是世界性的，跟第三世界的廣大窮苦人民聯合在一起的，較理性的民族主義。我們不願這一塊美麗的土地在新殖民主義的滲透下變成帝國主義肆意吞噬的一塊肥肉。這塊土地永遠屬於漢民族後裔生存的空間，我們立誓建設這塊土地為人間樂土。

在武力抗爭異民族入侵歸於失敗之後，台灣居民所採用的抵抗方式往往是文化的、思想的、藝術的非武力抗爭方式。台灣的秀異份子，不屈不撓地為台灣居民發言，被撲殺、囚禁、流放也不改其志，為台灣燦爛的未來遠景貢獻了生命與心血。

日據時代的新文學運動證實了這個運動是代表台灣居民反奴役心聲的台灣秀異份子壯烈的抗議運動。台灣新文學運動開始於民國九年，結束於民國三十四年大日本帝國的崩潰。前後大約有四分之一世紀的歷史。流貫台灣新文學運動主要的根本精神在於反帝、反封建便是反殖民統治，反落後、愚昧、迷信的社會改革運動；當然具有濃厚的保鄉衛土的色彩。台灣新文學運動亦步亦趨地跟隨着當時的抗日民族運動的發展，吸收外來文學的精華，建立了台灣文學的離型；它指向統合中國傳統文化和台灣地域性文化（regionalism）熔於一爐的自主性（originality）豐富的文學。這是台灣歷史底特殊性遭遇所帶來的自然結局。日據時代的新文學運動大約反映了抗日民族運動的兩種意識形態。其一為從十五次議會設置請願活動到台灣自治同盟活動的屬於資產階級的非武力抗日運動。這些活動強烈地反映出台灣資產階級邁向自治的意願；而運動開展的方式是溫和的、漸進的。我們只要憶起賴和、楊雲萍、黃得時

、張文環、吳濁流諸位先輩作家的作品，就不難察知他們作品裡所隱藏的「全民性」的自治意願。特別是在賴和先生的短篇小說裏，我們看到反帝、反封建的強勁的抗議、控訴的力量却看不到對未來烏托邦式的幻想（vision）。雖然賴和先生很同情窮苦的農民，但是這出於人道主義的胸懷，却不是傾向於某一種階級的代表。同樣，在張文環先生臨死前所完成的長篇小說「在地上爬的人」，我們看到張文環先生帶有濃厚的同情心描繪了窮苦農民的苦難，但張文環先生也缺少了對台灣社會未來的構圖，却着力描繪了日據時代台灣資產階級的興起與迎合。顯然張文環先生並沒有特出任何一個階級的企圖，他要反映的是特殊底歷史性轉變下全體台灣居民的命運。至於吳濁流先生的長篇小說「亞細亞的孤兒」，始終描寫的是屬於大地主階級的知識份子的漂泊和悲哀，也象徵了整個台灣居民共同的命運。顯然吳濁流先生也並沒有任何偏向於一個階級的觀點，他露出了強烈的自主意願。

在新文學運動的後期，隨着文化協會的分裂，新一代的台灣知識份子接收了西方社會主義各種流派思想的洗禮。從楊逵、王詩琅、龍瑛宗，直到呂赫若這些先輩作家傾向於跟勞工大眾的結合。既然他們的觀點是國際性的，自然他們接受台灣特殊的歷史性命運之外也堅決地主張跟普遍性的、世界性勞工運動取得牢固的結合。他們通常有清晰的烏托邦思想，對完全社會有一套現實的構圖，也有具體地走向理想主義社會的程序、步驟、方式的腹稿，楊逵先生的「送報伕」明顯地具備了這些特色。

雖然時代已轉移，社會結構已有蛻變，但日據時代新文學運動的這兩種意識形態仍然支配着戰後台灣文學的動向。但只要台灣文學能繼續有力地反映台灣居民的共同意識，描畫了台灣居民豐富又深刻的人性，不背叛台灣居民的抵抗精神，那麼台灣文學始終能茁壯地繼續生長，踏入世界文學之林。這真是沒有土地，哪來文學呢！

台灣文學應以本土化爲首要課題

彭瑞金

在靜默中循着一定的軌迹發展的台灣文學，純粹由於七十年代的一場文學風暴——鄉土文學論戰，引發了人們對它的內涵與質分做多角度的認真的省思和檢視。這一在過去處於不確定狀態的文學名號，一夜之間，既要面臨諸多疑忌的眼光、銳利無情的剖示，又要面對過份熱切的擁抱，使得原本清晰的面目因肢解而模糊，原本概念化的認知將面對嚴苛、挑剔的剖析。顯然一切在於歷史因緣的錯誤促使台灣文學扮演這麼矛盾的角色，也使得這場風暴，由帶着激情的論爭到冷卻澄清的省思過程，顯得格外的漫長。

畢竟這對台灣文學本身而言並不是一件壞事，拂去激情的爭議與擁抱之後，我們藉此機會面對一串十分嚴肅的命題——到底台灣文學能不能成爲一獨立而完整的文學脈流？緊接着，它的承傳如何？它應如何拓展？這些都是值得我們認真考慮的事。堆積而來的問題成爲台灣文學過重的負荷，但也是必然要

歷經的煉獄。緊接台灣文學存在與否的論爭之後，關於台灣文學內質的爭議也極為多歧，因此，台灣文學所需要的內省便不僅止於史的荒疏，也要面對質的再評估。坦白說，打自名份的詮釋開始我們便遇到了困難，如何從歷史多歧的名份中兼及台灣文學精神的內底與台灣文學遠景的拓展，都極難避開惡意的攻訐和善意的曲引，有人試圖以其質的一端——鄉土文學來涵蓋全局，與有人試圖以對它的期待式的咒語——民族文學……，來做為它新的血流動力，顯然都不夠呈示它全部奧秘特異的內涵，也不足以促使走向開闊的原野。

名號問題對於真實的文學本體而言固其餘事耳，然而今天的台灣文學不同，它面臨內聚力全面渙失的重要決定性關鍵，面臨認真凝聚在這一地域上文學的特質、或者放棄對這一地域特質的堅持做一抉擇。台灣的文學正如台灣的歷史一樣，是一篇篇滄桑斑駁史頁的複合體，諸多異樣而醒目的質素，構成駁雜多元性的面貌，雖然這些被稱做異質的東西，增添了台灣文學史頁多姿的風貌，然而也帶來了台灣文學成為無根漂泊、如水浮萍般的隱憂。當面臨文學荒原的統整與掙脫眼前僵局的雙重壓力時，台灣文學何去何從便成為牽連殊廣的問題，因此出現有人用諾貝爾獎的量尺、有人用中國傳統文學的墨斗、有人假設中國統一之後的政府觀點……，不一而足，都自許為台灣文學發展的指針。回到前面一談名號便全面觸礁的問題，我們將不難發現，混亂與多歧的意見乃源自於台灣文學欠缺評估的依據，無法從它多元而充滿異質的形貌下理出一道準則來，所以建立以台灣文學本質為前提的檢視網，用以貫穿台灣文學的歷史與未來，成為刻不容緩的事。

我們追溯到「台灣文學」這一稱呼的確立，做為在台灣這塊地域上出現的文學的檢視網的重要性，

不但可以廓清內聚力渙散的疑慮，也可以透過這個名份的確立建立一質分確定的檢視網，做為我們尋覓台灣文學源頭，為長期潛藏中發展而顯得面貌不夠朗廓的台灣文學理出明確的面目來，也可以做為對現代作品自我檢查的信條。只要在作品裡真誠地反映在台灣這個地域上人民生活的歷史與現實，是植根於這塊土地的作品，我們便可以稱之為台灣文學。因之有些作家並非出生於這塊地域上，或者是因故離開了這塊土地，但只要他們的作品裡和這塊土地建立存亡與共的共識，他的喜怒哀樂緊繫着這塊土地的震動絃律，我們便可將之納入「台灣文學」的陣營；反之，有人生於斯、長於斯，在意識上並不認同於這塊土地，並不關愛這裡的人民，自行隔絕於這塊土地人民的生息之外，即使台灣文學具有最朗廓的胸懷也包容不了他。有人把這樣的檢視網稱做「台灣文學」的「本土化」特質，其實這不只是一項特質而已，應該是台灣文學建設的基石。溯此而上，我們不僅可以以此檢視數十年的台灣新文學運動，甚至可以檢視三百年來自荷鄭以降的所有台灣文學作品，從這裡我們證明了台灣文學自有其歷史的淵源和它獨特的精神傳統。

透過這一檢視，追跡溯源，不但足以證明「台灣文學」既非私生亦非棄兒，同時透過這樣的檢視網也可以濾清所謂異質的東西，證明台灣文學的本體乃是根植於本土的產物。嚴格說來，「台灣文學」是不是經得起諾貝爾文學獎的考驗，是不是具備世界前衛文學的技巧，乃是第二線的問題，我們是不是能從台灣文學多元性的文學質素中和多變化的因子中，確立本土化的台灣文學才是最主要的課題。今天我們的文學若果能從縱軸上承續三百年來苦難的台灣歷史命運，能在橫面上綜括一千八百萬實存於島上的人民生活風貌，不論多麼粗糙的表達技巧，我們仍會認得那是我們的聲音，用我們的口唱我們的心，縱

使沙啞又何妨。

因此我們要強調「本土化」是最具透視力的網，透過這面網，我們可以鬆口氣說，我們的祖先確實實用自己的歌喉、我們自己的聲音，唱我們的心聲。「台灣文學」的承傳確定我們是有詩有歌的民族，我們在這裡可以找到我們是個有自己文學的民族の自信。同時，按着歌聲尋去，我們又要發現，無論苦難多深、災禍多深，這樣的歌聲並不會稍輟，也不會變調，它是整個台灣土地的聲音，我們有責任吟唱下去。

（刊於一九八二年四月「文學界」雜誌）

現階段台灣文學本土化的問題

宋冬陽

台灣文學的宗派問題，在最近一兩年來逐漸浮現。自鄉土文學論戰以降，台灣的作家又發展出兩種理論，一是「台灣文學本土論」，另一是「第三世界文學論」。這兩種理論究竟是兼容並蓄的呢，還是水火不容的呢？這個問題已引起有心人的憂慮。

李喬在最近已經指出：「『自主性、本土化論者』、『第三世界論者』，今後是否形成水火不容而自相殘鬥，令關心台灣文學的人痛心呢？關於這一點，如果回顧台灣陷日期間，文化協會的種種往事，是令人憂心忡忡的；但願這一代的知識份子們、作家們，不再抱持着『小台灣小心眼』的可悲心性才好。」（註一）

這種憂慮的看法，在最近召開的台灣文學研究會第二屆年會上，陳映真的演講也特別提到。稍早他在離台前的一場公開演說中，也針對台灣文學的宗派問題提出如下的看法：「文學上的宗派，一如其他思想上的宗派，只要它夠得上是真正的宗派就是好的，可互相討論、吵架、論戰，對整體的進步與發展有很大的貢獻

。這篇文章對一九七七年論戰的來龍去脈，有極其詳盡的交代。不過，對於鄉土文學論戰的意義，這篇文章並未進一步申論。

基本上，一九七七年文學論戰的意義，大約可以從下列幾點來觀察：

沒有專業知識的人一起討論知識問題一樣，對台灣文學的發展沒有貢獻。何況，文學宗派和文學在藝術上的評價，並沒有一定的關係。」（註二）

李喬與陳映真同時對文學宗派的分歧表示焦灼，可以反映出現階段台灣文學的發展已經進入了陣痛的時期，究竟日後會催生出如何的結果，目前正引起一般關心台灣文學前途者的密切注意。

我們不知道，台灣文學本土論者與第三世界文學論者會不會如李喬所說，將重蹈日據時期文化協會分裂的覆轍？我們也不知道，這兩派文學理論陣營會不會如陳映真所說，因各自膨脹、誇張而忽略了文學創作？但是，有一點我們可以確定的是，今天台灣文學會演化成現在這個面貌，原是有它的歷史背景。

這兩種文學理論的出現，絕對不會是早熟的；台灣文學的發展將會因這兩種理論的激盪而更形成熟。本文的目的，便在探討台灣本土文學論與第三世界文學論的形成原因及其內容；同時，也將進一步分析雙方的得失，以及對日後台灣文學的影響。

鄉土文學論戰的意義

無可否認的，一九七七年的台灣鄉土文學論戰，對現階段文學理論的塑造有很大的衝擊。如果不瞭解鄉土文學論戰的內容，則對今日本土論與第三世界論的形成背景就不容易弄清楚。

到目前爲止，對鄉土文學論戰能夠做全面性的回顧，當首推陳正醒的「台灣的鄉土文學論戰」（註三）。但因思想、文化的貧困，批判精神的缺乏，使得宗派所需的一些基本條件（如知識、哲學、思想、文化）付諸闕如。在這樣情況下所標榜的宗派，往往誇張、膨脹宗派意識而忽略文學創作。早熟的宗派主義，就像治環境的限制，台灣作家對於他們所賴以生存的社會經濟條件，很少展開全面而公開的評估。鄉土文學論戰正好使台灣作家有了一個徹底回顧與反省的機會。

一種文學的誕生與成長，往往不能脫離它所處的社會經濟條件的制約。今天台灣文學會出現當前這樣的面貌，乃是在一定的歷史背景與客觀環境之中釀造出來的。在整個鄉土文學論戰過程中，對台灣文學與現實社會經濟之間交互關係的過程，討論得最爲周延的，應屬王拓無疑（註四）。這方面的辯論，可以說使得文學工作者警覺到客觀環境對文學創作的影響，而且也更警覺到身爲一位作家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這種警覺對後來兩種文學理論的萌芽，不能不說是相當具有啓發性。

第二，鄉土文學論戰，釐清了三十年來官方文學與民間文學兩種不同路線發展。在此所稱的「官方文學」，乃是指根據國民黨文藝政策，配合政治上基本國策所寫出的文學作品。在論戰中，代表官方立場的批評者對鄉土文學的抨擊，主要有兩點：「以指控鄉土文學具有強烈的分離主義；以指控鄉土文學極有可能變質而只在宣揚一定的意識形態（例如「工農兵文學」）。」（註五）

但是，在爲鄉土文學辯護的作家中，對於這些指控並不予以理會。王拓在「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一文中，指出鄉土文學「就是根植在台灣這個現實社會的土地上來反映社會現實、反映人們

生活的和心理的願望的文學。它不是只以鄉村為背景來描寫鄉村人物的鄉村文學，它也是以都市為背景來描寫都市人的都市文學。這樣的文學不只反映、刻劃農人與工人，它也描寫刻劃民族企業家、小商人、自由職業者、公務員、教員以及所有在工商社會裏為生活而掙扎的各種各樣的人。也就是說，凡是生自這個社會的任何一種人、任何一種事物、任何一種現象，都是這種文學所要反映和描寫，都是這種文學作者所要瞭解和關心的。」（註六）這段陳述等於糾正了一般對鄉土文學的曲解，而且也為鄉土文學的範疇做了最為廣泛的界定。總而言之，台灣鄉土文學乃是以定居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民生活經驗為中心，透過文學的形式來表現他們的挫折與奮鬥以及悲傷與歡愉。

第三，鄉土文學論戰，總結了戰後台灣文學中「孤兒意識」和「孤臣意識」的發展。在過去三十餘年中，台灣文學有兩股主流相互消長，一是代表官方的「反共文學」，一是來自民間的「抗日文學」。反共文學是在五十年代的特定政治環境中孕育成型，在這些作品中暗藏一股「孤臣孽子」的流亡心態；抗日文學則是承續日據時期台灣作家的精神，在作品裏沾染了失落的「孤兒情緒」。無論是孤臣文學或孤兒文學，在發展過程中都沒有經過全面性的總檢討。這次文學論戰使得雙方都有沉思反省的機會。反共文學是既定的官方政策，經過論戰的洗禮是否做了修正，至今仍難判斷；但是，在抗日文學這邊，孤兒意識在論戰中得到過濾提煉的機會，把徬徨無依的心態化為對台灣本土的強烈認同，這種轉變就成了日後本土文學論的張本。

第四，鄉土文學論戰，使得台灣本地作家陣營內部有了新的展望。在論戰中，作家不僅對過去台灣文學進行全面的回顧，而且對以後文學的前途也開始尋找新的出路。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台灣文學」這個名詞的確立，是在論戰之中完成的；同樣的，另外一個「在台灣的中国文學」之名詞，也在辯論的文章中廣泛

使用。這兩個名詞所涵蓋的觀念，牽涉到一個文學工作者的立場。

在台灣本地產生的文學作品，究竟應該稱為「台灣文學」，還是應該稱為「在台灣的中國文學」？這個問題就變成日後本土論者與第三世界論者的爭論焦點。因為，這個問題密切關係到一個作家對文學的認識，以及對未來文學發展所抱持的態度。

總的看來，一九七七年的鄉土文學論戰，對台灣文學的發展是非常有幫助的。這場進行長達一年多的辯論，變成了一個分水嶺。台灣文學由單元走向多元，以至出現分殊的趨勢，都在論戰之後更加明晰呈現出來。現階段本土論與第三世界論之間的相互競爭，大約都可在論戰的文章中找到理論根據，這一點值得進一步探討。

兩種理論的奠基者：葉石濤和陳映真

葉石濤在一九七七年五月發表了一篇「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註七），對台灣近三百年來的文學史做了一個概括性的總回顧。在這篇論文中，他提出「台灣意識」一詞來詮釋台灣鄉土文學作品的性格：

「台灣一直在外國殖民者的侵略和島內封建制度的壓迫下痛苦呻吟；這既然是歷史的現實，那麼，反映各階層民衆的喜怒哀樂為職志的台灣作家，必須要有堅強的『台灣意識』才能了解社會現實，才能成為民衆真摯的代表人。惟有具備這種『台灣意識』，作家的創作活動才能紮根於社會的現實環境裏，得以正確地重視社會內部的矛盾，透視民衆性靈裏的悲喜劇。當一個作家在描寫他生存的時代時，現實的客觀存在固然會決定作家的意識，但作家的意識也會反過來決定存在；而這時候，構成作家意識的重要因素之中，積累下來